


变迁中的 社区权力与秩序

焦若水◎著

变迁中的 社区权力与秩序

焦若水◎著

D669.3
=9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中的社区权力与秩序 / 焦若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6010 - 7

I. ①变… II. ①焦… III. ①城市—社区—研究—北京市
IV. ①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36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孙 萍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社区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首次提出社区的学术概念，到后来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先借以身立命、扬名立万于世界社会学界的一系列芝加哥城市社区的研究，再到当代仍方兴未艾的社区发展、社群主义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社区研究已历经130年。

一百余年的时光，丝毫没有消磨社区的重要意义和社区研究中诸多理论的光芒。其主要原因就是，社区乃人类生存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特别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讲，它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组织。其特殊意义在于：第一，它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社会缩影，欲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社会进行研究，可以先从一个社区或几个社区入手，这些社区通常能够反映这个社会构成的许多要素和面相。第二，对某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研究对象过于庞大。研究者常不得要领，很难展开自己的研究。而一般来讲，社区大小得当、规模适中，因而受到进行案例研究的社会学者的广泛欢迎。

以上特殊意义，在外国如此，中国亦如此。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的社区是农村。当初借鉴英美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费孝通，即凭借中国农村社区研究的《江村经济》而一举成名，并终身得益。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2000年前后的城市社区建设，一方面，是希望借社区建设之力将城市中的邻里共同体建设成当初费先生所研究的充满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传统乡村社区；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社区制取代街居制的变迁，逐步将政府无所不管、无处不在的全能型基层政府转型为有限的、服务型的、合作治理型的基层政府，从而使得基层社会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现代国家的模式。

针对当代城市社区的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焦若水的著作《变迁中的社区权力与秩序》，即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该书的作者在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力图通过对三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入翔实的实地研究，以社区组织网络为研究切入点，利用社会网络 UCINET 的分析方法，揭示出不同社区的横向或纵向关系的网络特点；并进一步比较不同社区之间组织网络的差异，及其如何影响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社区治理。

焦若水认为，社区组织网络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与社区研究本身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中观研究定位有着相当的呼应，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发现，作为一种国家运动开展的社区建设在地方性空间上受着不同的组织网络与逻辑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一个与国家初衷相背离的社区建设实践。在社区组织网络的主导层面，横向的合作逻辑成为主导关系类型，国家力图在社区层面重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努力同时受到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制约，社区日益成为一个多主体竞争的空间范畴。社区组织的不同网络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有着不同的影响，国家社区建设与社区自身逻辑的差异，使得各种网络之间出现一定的紧张关系，如何调适社区组织网络之间的关系，促使社区真正由原有的基层管理单元向治理的转变，厘清社区组织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与互动规则，是社区建设未来的关键。

研究还指出，与威权主义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不同的是，转型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治理格局，可将其称为梯形治理，在这样的治理格局中，国家—社会—市场三者各自扩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混合了各种要素的结合性治理模式，因而既不是威权主义下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的倒三角形格局，也不是市民社会理论中强有力的社会自下而上生发出对国家控制形成的治理图景。这种独特的治理图景提醒我们在运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要对其有效的边界保持一定的警惕，关注并总结中国社区转型过程中的实践逻辑，发展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社区理论。

可以讲，《变迁中的社区权力与秩序》反映了焦若水对于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思考，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自不待言，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思考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意义，对我国社区治理的实际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全书思路清晰、主题明确、层次结构严谨清楚、调查资料十分丰富，体现出作者对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的追求。

本书的基础是其博士论文。作为他的导师，我了解焦若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努力与勤奋。焦若水学习和工作都相当认真、负责，且专业知识扎实，涉猎学术领域较广，对于许多问题能够追根溯源，多层次和多视角地进行探讨、考察。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览群书，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后来利用国家奖学金项目，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跟随特里·克拉克等教授对社区相关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与建议。在此过程中，焦若水进一步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文献，在问卷调查以及数据的分析方面，也力求严谨规范。因此，这篇论文无论是在匿名评审中还是在论文答辩会上，都获得了评审委员、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

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以导师的身份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他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夏建中

2015年2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本书试图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历史变迁过程，其核心问题是：社区怎样在微观层面反映出社会转型的实践进程，不同的社区形态及其内部构造的转型又怎样进一步影响社区治理格局，它们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变迁，特别是与当代流行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本书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的比较分析来对这一议题做一尝试性的研究。

由于社区建设运动是市场转型背景下国家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再造的一项社会改造工程，其中关键的要素是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变迁问题。因此本书选取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东城区 HZH 社区、西城区 LQY 社区、海淀区 YZX 社区。相比较而言，在三个社区中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中分别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个案社区的选取初衷在于不同的社区既有助于比较社区之间的差异，又为研究宏观的国家—社会—市场转型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在研究方法论上，本书力图克服已有社区研究中摇摆于宏观—微观之间所造成的层次谬误问题，选择社区组织网络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在研究设计中，将社区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外部嵌入型组织三类；着重分析了社区组织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通过对社区组织的三种关系类型——横向合作关系、纵向领导关系和转型的中间关系——的分析，建立完整的居民—社区组织—社区治理—社会转型的论述路径，凸显研究社区时的能动意识。

在对社区组织网络的比较中，本书首先从社会转型的生活视野出发，对推动社区转型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尽管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力是国家主导的基层政权建设与政治改革，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全球

化、制度环境、互联网络、知识阶层、个体认同变化等对社区转型有着很大的影响。社区中多元的行动者立足于社区，既强调地点和空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又可以脱离社区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发挥影响，从而对整体社会转型产生微观却又重要的影响。

本书从社区研究的中观逻辑出发，利用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对三个社区的社区组织网络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本书对于社区组织网络的分析贯穿着两条比较的主线，一方面，系统地比较了社区组织网络内部不同网络关系，及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将三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系统的比较。在对社区组织网络进行分析时，将社区组织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以居民为主自下而上的社区组织、政府派出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通过经济契约性形成的社区组织为分析对象；以整体的视角审视了社区组织网络关系，从市民社会与威权主义两大理论传统出发，将社区组织间的关系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横向关系、纵向关系、纵横结合关系。通过对三个社区中组织网络演变过程的田野考察，深入地分析了社区组织网络生成、发展与互动过程。利用对社区组织网络规模、网络中心性、网络密度、网络互动的数量分析，比较了三个社区之间组织网络的差异及其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分析了在不同的社区生态中，社区组织网络的差异如何产生并影响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社区治理。

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国家运动开展的社区建设在地方性空间上受到不同组织网络与逻辑的影响，从而可能出现一个与国家初衷相背离的社区建设实践。在社区组织网络的主导层面，横向的合作逻辑成为主要的关系类型，国家力图在社区层面重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努力同时受到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的制约，社区日益成为一个多主体竞争的空间。社区组织的不同网络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有着不同的影响。国家社区建设与社区自身逻辑的差异，使得各种网络之间出现一定的紧张关系。如何调适社区组织网络之间的关系，促使社区真正由原来的基层管理单元向治理单元转变，清晰界定社区组织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与互动规则，是社区建设未来的关键议题。

本书通过对不同城市社区的考察表明：社区治理中的组织网络和治理模式是一种有别于威权模式与市民社会模式的新治理模式。和华尔德对于工作单位的研究相似，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样有着“共产党社会新传统主义”的特点，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梯形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

家仍然在社会治理控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通过与草根生长的基层自治力量建立对接的关系，国家不断融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而以草根形式产生的新治理主体通过与国家互动形成动态的、互构式的治理关系。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有助于社区善治形成的组织关系并不是普特南在西方语境中所观察到的横向关系模式，而是结合了横向与纵向关系的结合性关系的转型模式。社区治理的这种特殊模式不但是转型社会的产物，而且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研究这种转变中的治理实践，不但有助于检验西方流行的各种治理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而且将为发展本土的社区理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以社区组织网络认识社区	(2)
一 社区成长:现实的挑战	(3)
二 社区观察:理论的革新	(6)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9)
一 从居民参与到社区组织	(9)
二 从社区组织到社区组织关系	(14)
三 社区组织网络的浮现	(17)
四 社区组织网络与社区治理	(20)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目的	(27)
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	(31)
第五节 研究意义	(33)
第二章 研究设计	(36)
第一节 研究对象介绍	(36)
一 如何选取个案	(36)
二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37)
第二节 研究方法	(42)
一 资料收集	(42)
二 资料分析	(43)
第三节 核心概念	(44)
第四节 社区组织网络分析的模型建构	(45)
一 社区组织整体网	(46)

二	社区中的三种组织逻辑	(46)
三	社区组织关系的三种类型	(48)
四	社区组织网络的三种秩序	(49)
第五节	本研究的难点	(51)
第三章	社会转型的社区谱系	(53)
第一节	社区转型:转型的社会生活视野	(54)
第二节	社区转型的类型	(60)
第三节	社区转型的推动力及其趋向	(68)
第四节	公民社会的微观图景:社区的组织观察	(74)
第四章	社区组织网络中的行动者	(79)
第一节	社区组织网络中的个体	(80)
第二节	社区组织网络中的群体与组织	(92)
第三节	跨越社区的社会行动者	(106)
第四节	小结	(109)
第五章	社区组织网络的结构展现	(111)
第一节	社会网络研究理论与方法概略	(111)
第二节	社区组织生态学:结构分析	(116)
一	社区组织整体网	(116)
二	社区组织的中心性分析	(121)
三	社区网络的角色分析	(130)
第三节	社区组织网络的关系展现	(141)
一	社区中的纵向组织网络及其关系	(142)
二	社区中的横向组织网络及其关系	(149)
三	社区中的结合组织网络及其关系	(159)
第四节	社区组织网络动态分析	(16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70)
第六章	社区组织网络关系与社区治理	(171)
第一节	社区治理的逻辑	(172)

第二节 社区组织网络结构与社区治理	(174)
一 组织纵向关系与国家建设	(175)
二 组织横向关系与网络扩展	(178)
三 结合性关系与社会转型	(182)
第三节 社区组织网络的社会效应	(18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03)
第七章 总结与讨论	(206)
第一节 中国城市社区的转型谱系	(207)
第二节 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图景	(211)
第三节 梯形治理: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视角	(214)
第四节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适用于中国吗?	(217)
第五节 讨论	(219)
一 研究存在的不足	(219)
二 研究未来的取向	(221)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52)

第一章

导 论

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也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个由 Gemeinschaft 到 Community 再到社区长途旅行来到中国的学术词语，曾经主导了中国社会学发端扩展的重要时段。乡村社区不但是中国社会学早期研究的焦点，而且在相当意义上成就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与城市社区的扩展，大量新型社区的出现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承接这一转变的一个容器，原有在社会学中略带乡愁般的一个学术名词经过政府部门的采借，竟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整合性话语，并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关联起来。由此，我们在谈及社区时首先面对的是社区的多重面相：作为行政管理的社区、作为学术研究的社区、作为共同体的社区。概念与界定的多歧必然有其深层的原因，这种紧张，不仅仅反映在研究与实践的冲突上，而且在深层次上揭示了社区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实际上必须从这些看似平淡琐碎的社区生活中开始，理论的使命也恰恰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社会现实中发现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因。以往的研究多建立在经验性的分析总结上，对社区观察的视角也存在着冲突，比如关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发现的是国家不断地对社会的侵入，社区不过是国家治理的单元；而关注于社会的研究则发现了社区中社会不断成长的历程，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堪称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这种分裂的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国家—社会或国家—社会—市场分析范式上，而这样范式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及其方法的限制，难以对社区组织的结构、组织网络及其关系进行实证性的研究。社会网络理论及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发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研究社区中复杂社会组织网络

关系开辟了新的视野，本书通过对北京市三个社区中社区组织全网及其组织网络关系的比较研究，力图理解城市社区组织建立新的认知框架。

从社区组织网络来认知社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普特南开创性研究引发的讨论。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普特南提出公民团体和社会资本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但是除了对两种类型的公民社团做了一般性的区分之外，普特南并没有在这些团体如何在更大范围促成有关社区事务和整体性社会形成上面做出更为详细的区别和说明，横向联系的组织与纵向联系的组织对于社区治理影响的研究也是模糊的。毫无疑问，由社区转型所开启的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将远比主导已久的市场转型研究更为复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制度—生活”正在取代“国家—社会”成为分析中国的新框架。^① 超越普特南研究中浓重的文化历史意味，在更为具体的社区组织层面研究不同的组织关系对于社区治理的影响，将有助于廓清我们对于社区本身和社区层面社会转型的认识。本书比较性地考察了三个社区中不同组织关系与社区治理的关系，力图为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开辟一个社会生活层面的新视野。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以社区组织网络认识社区

研究无非是对现实变迁和理论发展两个方面的回应与反思。中国城市社区的发育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伴随着城市化、法律环境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迁，城市社区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整合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面临的尴尬往往是不能对社区中的种种变化做出有效应对，对社区主体的分析也往往是顾此失彼、歧见纷呈。在福柯的隐喻中，现代社会结构是一种断裂的和异质性的社会空间，只能通过动态和分散的制度与关系结构的型构（figurations）来加以概念化。^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少有一个社会像中国城市社区这样符合福柯的构想，不过以往人们习惯于以地理空间的静态视角看待社区，无论对

^① 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② Pamela Major-Poetzel, 1983,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社区结构还是对社区资源的分析，都显得过于僵死而缺乏整体性与有机性。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试图走出滕尼斯式社区研究的传统，选择更为具体的社区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社区组织被认为是连接微观与宏观的一个合适工具而受到社会学家的青睐。^① 以社区组织网络认识社区，意味着需要突破以地理空间的静态视角观察社区的局限，将社区治理和运转置于结构性要素与各类社区资源组合互动的网络化格局之中。社会网络概念，由于内在地具有穿透这类空间构型的潜质，很有希望发展成为继社会结构之后社会学的又一个敏感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

一 社区成长：现实的挑战

在中国城市公民社会崛起的进程中，存在着两条清晰的发展路线：其一是由政府放权、授权、居委会和街道职能重塑等一系列改革，以培育公民社会、追求共同治理为目标，自上而下推动的民主治理改革；其二是由市场化进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形成的日益庞大的业主群体，和特殊利益群体因自身利益觉醒而主动开展的、以居住社区为单位的一系列自下而上追求自我发展的公民有组织活动，造就了中国最具实际意义、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并成为推动城市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② 因此，国家基层建设和市民社会的生成在时间顺序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社区的崛起既是国家建设的直接后果又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因。在政府推动的社区建设中，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社会建设所有的内容几乎都被纳入其中，本身已经造就了社区建设的复杂性，而两条线索上不同群体相异甚至是对立的需求也使得社区建设的发展轨迹充满了变数。

从政府推进的角度来看，单位制终结后国家如何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③，社区几乎是在偶然间成为重新整合社会的新单元

^① Robert J. Sampson, 1991, "Linking the Micro-and Macro Level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s*, September, 70 (1): 43-64.

^② 王颖：《公民社会在草根社区中崛起》，《唯实》2006年第10期。

^③ 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雷洁琼：《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形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 26 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在基层政府管理体制上先后出现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等,对具体的社区管理多样性的探索更为普遍。

虽然当下的研究将关注点放置于惯常所说的社区“三驾马车”——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之上,^①但是如何培育社区组织,协调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角色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社区中出现的大量民间组织,政府对其发展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政府已经意识到,应该发展民间组织来共同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担心民间组织的发展会危及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较为严格的政策。^②

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组织,居委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来的“小脚老太太”改为社区工作者,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形象地描述了自己是仙鹤的头(情况明、底数清)、兔子的腿(社区的琐事、杂事多,跑得快)、青蛙的肚子(社区人口复杂,大量弱势群体、“两劳帮教”和社会闲散人员的不满和怨气多)、百灵的嘴(人民调解与邻里纠纷解决、政策法规和管理条例的学习解释)。^③在这样一个多面居委会中,居委会如何处理好贯彻执行政府任务和发挥居委会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成为争论的焦点。

从社会发育的角度而言,在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和居民由体制内快速流出的背景下,大量基于居民自组织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出现,其中既有从原有政府中分化出来的组织形态,又有大量出于娱乐联谊需要产生的居民组织,还有大量居民结成的互助型组织,特别是作为新型社区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堪称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④由于缺乏与政府、市场进行互

① 对于中国城市社区中的治理主体,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三驾马车”,也有研究将街道办、社区党组织、业主等纳入进来。

② 徐祖荣:《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研究》,杭州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4 页。

③ 2008 年 5 月 20 日访谈街道居民科长,原居委会主任。

④ 夏建中:《北京城市新型社区自治组织研究——简析北京 CY 园业主委员会》,《北京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夏建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文史哲》2007 年第 3 期。

动的规则和制度，社区居民在维权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纠纷乃至流血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物权法》等相关法规政策的颁布及实施，使业主委员会等维权类社区组织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在城市社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社区互联网的居民组织与活动日趋活跃，社会网络、虚拟网络和社区现实空间中的社区组织交相互动，织就了社区生活的另一幅图景。^①

社区秩序的关键，社区建设的归宿，都在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与逐步强化。当前，街区空间中行政权力整合的程度已经大大增强，社区成员的整合虽然较为滞后，但业已开始，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队伍、“改制”后的居委会，都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这些利益取向不同的社区组织“组织”到将要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中，更进一步，如何将行政力量与这个共同体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统一将是社区发展与建设面临的深层问题。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社区共同体将从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事业中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并在内部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在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分离的边缘地带，社区共同体与社团组织一起提供了介乎三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缓和冲突矛盾、沟通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社区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未来社会结构整合的模型。^②从根本上讲，社区中政府、居民、社团、专业性组织等各种主体存在着面对面的接触，社区的发育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多种利益团体的协商合作基础上，需要团体多样化、多元化，没有这些，社区的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没有真正社区意义上的生活。要使社区制度健康、快速地发展，必须加快培育社会组织的多样性，要扩大社会空间。多元利益的代表和团体能够有一个平等、和谐的协商合作的平台，社区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当下的社区建设实践也好，社区理论研究也好，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组织主体所镶嵌的社区环境，而孤立地分析组织间的互动。进一步来看，社区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也被悬置起来，从而影响了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来探究社区发展的可能。社区地区性社会与社会缩影的特

^① 卢汉龙：《单位与社区：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徐道稳：《城市社区服务反思》，《城市问题》2001年第4期。

^② 马西恒：《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